

# 中国管理研究的理论贡献

□ 杨 治 王砚羽 夏 军

**摘 要：**本文在回顾池太岚教授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管理研究如何做出相应的理论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制度环境下的动态性和历史情境下的独特性都使中国管理研究具备了形成理论贡献的基础。理论贡献是对我们已知或未知的管理问题，尤其是因果关系，进行探索并不断地累积新的知识。单纯地使用中国数据验证某种理论，或者是创立一个只在中国独有情境下适用的解释都不足以成为充分的理论贡献。本文继而指出了理论贡献的三个层次：指导性战略（orienting strategy）、个体理论（unit theory）和理论研究纲领（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并分析了不同层次理论贡献的差异。由于理论研究纲领探讨的是理论与理论间的关系，在这个层次上分析不同理论的联系更有助于做出理论贡献，使之成为一个努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五种理论关系，并逐一指出不同理论贡献的形式。最后，本文结合中国企业实践探讨了中国管理实践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理论贡献；管理研究；中国情境

## 一、引言

作为科学研究者，我们所从事的研究都力图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增加新的知识和理解。这条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所有从事科学研究学者的共识。管理学的研究从过去的经验主义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所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现在很多学者讨论的诠释主义，虽然立场不同，但大体上都围绕着“严谨”或“有用”展开，以解释组织和管理中的现象，回答相关的问题，做出相应的预测。中国的管理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西方管理学研究的范式。在延续一系列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遇到了本土化的困境与反思。有学者认为应该创立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体系，做出中国特有的理论贡献。本文在结合池太岚老师文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我们的几点看法。

池太岚教授在《管理学季刊》中发表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管理学研究——再看吸收西方理论和本地创新的关系》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制度环境下的管理学研究进行了讨论。首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有选择地和有创造性地引进国外经济和管理理论是不可分开的。其次，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制度环境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为管理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作者提出，中国管理学研究应融合各国长时间研究和积累起来的管理学知识，而不是建立“中国独立的管理体系”。再次，作者举例产权理论、内部化理论、知识基础观和实物期权理论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适用性和在动态制度环境下的进一步深化与创新。最后，就中国不断变革的制度环境而言，作者对企业与企业家的能力及行为取向，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了见解。池教授的文章清晰地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管理学研究的独特性和与西方理论的联系，也预示了中国管理研究的贡献。本文基于池老师文章的思路继续展开讨论。

中国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演化中，从先秦诸子百家起，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齐家，诸多经典的管理思想，无形中指导着企业的管理实践。东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使得中国企业在选择性使用西方管理理论的同时具有很多独特之处。首先，从制度环境的动态性来看，中国情境是提升管理理论研究的难得样本。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并逐步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迈进。长达3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深化了生产、分

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计划模式和政府对宏观及微观经济的干预（Peng & Luo, 2000）。而改革开放至今近40年的发展，中国转向了与计划经济机制相反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政府采用了宏观调控手段，通过行政管制和颁布政策影响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行为；另一方面，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政府的行政手段也出现了探索中的失误和不连贯的特征，使得企业运行处在复杂而动态的制度环境之中。这一特点为已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在复杂制度环境下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检验与发展的条件。例如，池老师文章中所提到的产权理论、内部化理论、知识基础观和实物期权理论，在中国的制度情境下都具有更深的理论发展。

从历史情境来看，Marquis 和 Tilcsik (2013) 认为，转型经济和新兴市场是研究历史作用的天然实验室。中国具有丰富的历史资源和系统的哲学体系，东方的集体主义、小农思想、中庸之道、差序格局等传统文化对企业的烙印深刻且广泛。尽管中国企业的管理理论和实践与西方管理理论密不可分，但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历史的烙印使得中国企业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的管理模式。因此，在管理和组织研究中，中国的历史情境成为扩展管理理论的丰富实践来源。例如，潘越等（2019）采用中国明朝至1990年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测度宗族文化。研究表明，地区内的宗族文化越浓厚，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小。Lippmann 和 Aldrich (2016) 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经历的多次社会经济转型和渐进式改革，使每一个时代都具有不同的集体记忆，形

成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群名词，代表了一个个时代的标签，例如“老三届”“知青”等。这些具有中国特定历史背景烙印的人，作为企业的员工或者管理者、创业者，都将形成丰富且有趣的管理实践，有利于充实当前的管理理论研究。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并不代表中国理论。要回答中国管理研究如何可以做出理论贡献，我们认为，应该先解答如下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理论贡献？换句话说，什么样的研究才能构成理论贡献？哪些研究不能成为理论贡献？第二，在什么层面做出理论贡献？为什么有些想法很难变成真正的理论贡献，而另外一些探讨却相对容易？第三，如何做出理论贡献？有没有一些基本的方向，可以指导我们去开展相关的研究，从而做出理论贡献？我们在下文逐一展开讨论。

## 二、理论贡献的定义

关于“什么是理论贡献”的话题，不免老生常谈。*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和 *Organization Science* 都曾做过多次的文章探讨 (Colquitt & Zapata-Phelan, 2007; Shapira, 2011; Suddaby et al., 2011; Sutton & Staw, 1995; Whetten, 1989)。总体来讲，不论是对已有理论解释范围 (scope) 的扩展 (Corley & Gioia, 2011; Whetten, 1989)，还是对已有概念联系的解释机制的澄清 (Cornelissen & Durand, 2012)，或者运用归纳法提出新的概念和关系 (Shepherd & Sutcliffe, 2011)，都可以构成理论贡献。一般而

言，所谓理论贡献，应该是对我们已知或未知的管理问题，尤其是因果关系，增加累积性的知识 (cumulative knowledge) (Bettis et al., 2016; Kepes et al., 2014)。这种累积性的知识能够使我们对已有知识的认识更加清晰或准确，或者对已有知识能解释什么，不能解释什么有新的认识，或者从已有知识中派生出对新现象的新解释。中国管理研究由于根植于区别于西方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管理学者可以在这些区别方面大有作为。池教授在文章中举了很多对应的例子，比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情境 (Bai et al., 2006; Li, 1996)。那么，我们是否只要用中国的数据或中国背景就一定能产生理论贡献呢？我们认为下面两种情况虽然有“中国特色”，但未必有理论贡献。

第一，仅用中国数据验证已有的理论不足以产生理论贡献。所谓理论，是抽象化的概念和概念间关系的逻辑体系 (Cornelissen & Durand, 2012)。一个成功的理论，在满足其假设的基础上，具有普适性。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如果成立，在满足其假定基础上，不论在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应该都具有解释力。除非当不同国家的研究情境潜在地改变了理论的基本假设，否则普适性的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仅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一个在美国已经验证过的理论，不足以给我们带来新的累积性知识，因此也不足以产生理论贡献。当然，如果能够发现结论与理论预测不同，可以追根溯源到原有理论的基本假定 (assumptions)，从而提出新的解释，进而产生新的累积性知识，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比如 Xiao 和 Tsui

(2007) 用中国数据发现, 拥有结构洞多的人在中国的组织中绩效表现反而更差, 这与传统结构洞理论的预测相反。进而作者指出, 因为在西方情境下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潜在的假定了个体主义的文化环境和认知, 而当这个潜在假定在中国情境下被改变后, 整个预测与结论就出现了反转。这一发现对结构洞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让我们认识到了原有理论逻辑的潜在假设和可能的局限, 增加了新的知识, 从而产生了理论贡献。

第二, 对中国独有的“中国特色”理论需要一个界定。就管理科学而言, 并无国别之分。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管理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正如上文所言, 理论是概念的逻辑(因果关系)的组合。如果一套逻辑言之成理, 那么在满足其假定基础上的环境中, 这套逻辑应该都具有解释力。中国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存在很多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要素,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管理研究要创造一个只有中国特有的概念体系和一套只在中国可行的逻辑。相反, 从中国现象中抽象提炼出一般性的概念, 并用合理的逻辑建立概念间的关系, 并能够在其他环境下检验理论的信效度, 在这一点上,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管理研究对世界管理学界的贡献。类似的例子也有很多。比方说, “家长式领导”的提出就是从中国传统“家”文化中提炼出的概念(Farh & Cheng, 2000), 经过概念化和定量化(operationalization, 即可操作性)之后发展出的一套不仅适用于中国, 而且同样适用于那些具有集体主义和高权力距离文化特征的国家 and 地区的理论(Pellegrini & Scandura, 2008)。

### 三、理论贡献的层次

理论贡献有大有小。我们常听说, 中国管理学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 学会了西方的逻辑实证的方法, 却丢掉了我们的思想, 以致在过去的 30 年里, 我们一直都缺少有足够创新的基于中国问题研究的理论贡献(蔡玉麟, 2016; 韩巍和赵向阳, 2017)。类似的评论有一定的道理, 但评价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贡献却并不容易。问题在于当我们评价理论贡献时, 面对的层次并不统一, 这给我们的评价带来了很大的困扰。理论贡献有层次吗? 为什么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一些理念就不能或很难变成管理理论? 我们在此借助社会学学者 Berger 和 Zelditch (1993) 的框架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按照 Berger 和 Zelditch (1993) 的观点, 对一个领域的贡献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 指导性战略(orienting strategy), 个体理论(unit theory) 和理论纲领(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需要指出的是, 这三个“层次”并无高低之分, 而是指对每一个研究对象的界定。

第一个层次, 指导性战略是指为理论发展提供基本方向或视角的基础性理论。它往往决定了我们问什么样的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基本假设, 包含什么样的概念, 概念间的基本联系等根本性的问题。这一类的理论常以元理论(metatheory) 的形式存在, 为解释现实现象提供基本的指引和研究方向(Wagner & Berger, 1985)。它往往体现出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假定(如我们所要研究的管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还是研究者主观认识的反映)、预设管理研

究背后所持的基本价值与目标等。在我们所熟知的组织理论中，制度理论、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可以看作此类指导性战略理论的代表。比如制度理论分析的核心是组织的合法性与同构（DiMaggio & Powell, 1983; Meyer & Rowan, 1977）。制度理论并不关心组织为什么不同，而是关心组织为什么会变得相似。所有后续概念的开发、逻辑的发展都围绕这一个中心视角展开。再比如，代理理论假定代理人是自私的，最大化个人利益的代理人如果与委托人的利益冲突，就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Eisenhardt, 1989; Jensen & Meckling, 1976; Ross, 1973）。于是在此假定基础上，所有研究的焦点都沿着如何使委托人和代理人保持利益一致展开（包括激励合约和治理结构设计等）。类似的指导性战略体现出的管理学伟大思想涌现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Smith & Hitt, 2005）。学者们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这么多的伟大思想？

现在难以产生类似“伟大思想”的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此类思想结构上非常稳定。比如制度理论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发展至今，其核心假定基本没有变化，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范围也没有大的改变。虽然会有不同的分支发展（比如制度逻辑，Thornton & Ocasio, 2008）认为组织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场域，从而同时面对多重趋同压力，但基本都延续了原有思想的分析视角和范式。第二，此类思想往往是对观点、价值的描述，而非对事实（facts）的描述。其本质难以完全被证伪，因此

难以完全被取代。实证上，我们无法证明一个代理人到底是自私的还是利他的，我们也无从证明组织只有合法性需求而没有效率的需求。这种实证上的不可证伪性一部分来自对核心概念的模糊定义。定义的模糊性使得这些思想总可以通过不断补充或变更应用范围来解释那些实证上的异常值，而成为理论范式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Kuhn, 1974）；第三，所有这些思想都需经历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任何一个“伟大思想”或理论范式的建立都是在一系列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假设的提出与发展、核心构念的建立都需要得到同行的认可和追随。而越来越多的后续研究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该思想和范式的有力工具，不断强化该理论的接受程度（Kuhn, 1974）。如制度理论的核心文献 Meyer 和 Rowan（1977）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被引用了 31249 次<sup>①</sup>，DiMaggio 和 Powell（1983）被引用了 45620 次；资源依赖理论的核心文献 Pfeffer 和 Salancik（2003）被引用了 31974；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文献 Williamson（1975）被引 42606 次。正是不断强化的社会建构过程使这些已经建立的思想及研究范式难以被取代，新思想也可能被已有理论的强大范式淹没。中国管理研究事实上只到 21 世纪初才加入这场理论的对话中，缺少足够的社会建构过程，重大突破尚待时日。

第二个层次是个体理论（unit theory）。个体理论层次指的是对特定的组织管理现象或问题做出解释的假定或因果关系模型（Berger &

<sup>①</sup> 根据 Google Scholars 引用数据统计（下同），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14 日。

Zelditch, 1993; Wagner & Berger, 1985)。个体理论从结构上通常包含一组特定概念 [通常根据指导性战略 (orienting strategy) 所构建] 以及概念间的逻辑联系, 并对特定组织管理现象做出判断。严格来讲, 个体理论是在理论与事实 (fact) 间作出的一个判断, 通过概念化和量化相关概念, 在实际情境中找到映射, 因此个体理论往往是可被验证的。正是因为对事实情境的依赖以及其可验证性, 变换原始理论所产生的环境往往能够产生诸多的变化和理论贡献。而中国管理研究过去 30 年发表的研究成果, 其理论贡献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层面。例如 Xia 等 (2008) 考察中国 1990~2003 年外资进入方式的变化, 从制度理论的角度认为, 外资进入中国的模式受到来自同一母国公司进入模式和进入中国同一行业公司进入模式的双重影响, 而新进入模式的出现与发展 (并购模式相对于过去的合资模式) 会减缓对传统合资模式的接纳, 并负向调节模仿效应在合资模式成长与衰退期的作用。在个体理论层面, 这个研究做出了三个方面的改变或贡献: 其一, 它把研究视角从过去传统国际商务个体企业层面研究外资进入模式转换为组织间层面的跟风效应。进入模式的选择并不是企业个体的离散的独立的决策, 而是组织间的基于相互模仿的社会现象。选择什么进入模式和放弃什么进入模式都与参照群体的行为息息相关。其二, 该研究揭示了企业的参照群体并不是单一不变的。过去对跨国企业进入模式的研究往往只关注来自同一母国的跨国企业群体, 而这个研究指出到达东道国同一行业的跨国企业也同样是重要的参照群体, 而且在新兴市场国家的环境下, 后者

的作用往往因为东道国政策的变化比前者更重要、更显著。其三, 该研究揭示了新旧进入模式的动态转换过程, 特别是新进入模式 (并购) 如何从边缘变为主流模式的过程。过去的制度理论研究往往只重点关注已有制度或惯例的扩散 (diffusion), 而这个研究不仅显示了曾占主导地位的合资模式的发展和衰退, 更进一步揭示新的并购模式的出现和发展对传统模式的影响。因此, 这三点变化都通过中国在 1990~2003 年这十几年外资进入模式演变的情境中展现出来, 并使我们对制度理论中的模仿机制、参照群体、惯例扩散和消退的动态过程有了新的认识, 同时使我们对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进入模式选择有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 言之成理, 符合观察。因此我们说该研究在个体理论层面上对制度理论和国际商务研究增加了新知识, 形成了新贡献。

第三个层次来自理论研究纲领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 (Berger & Zelditch, 1993; Wagner & Berger, 1985)。这个概念来自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s) (Lakatos, 1976)。如果说上文涉及的第二个层次个体理论主要讨论的是理论 (theory) 与事实 (facts) 的关系, 那么研究纲领讨论的则是理论与理论的关系。拉卡托斯认为评价重大科学成就的单位不是孤立的某个理论, 而是一组相互关联的理论系列 [ (拉卡托斯称其为研究纲领 (research program) ) ]。其中决定一个研究纲领基本命题的理论组成了这个纲领的“硬核” (hardcore), 而从硬核衍生出来用于解释具体经验事实的理论则构成了硬核的保护带。我们的科学研究事实上在不断扩大这个保护带的范围,

当由硬核派生出的假设不能满足现实观察时，我们通过修正衍生的理论来解释现实，从而实现了对保护带的加强和完善，于是一个研究纲领可解释的现象越来越多，对硬核的阐释越来越丰富，理论体系也越来越稳定。比如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认知科学就是基于“认知可计算”的研究纲领发展而来，其硬核是基于“认知活动是可以被计算模拟的物理活动”的判断。其发展过程从早期的符号主义，到中期的联结主义，以及现在的行为主义则都是因为现实对“可计算的认知”的挑战和不断修正（刘晓力，2005）。在这里，核心理论与不同分支共同形成一个研究纲领。当一个研究纲领不断启发研究者发现新的经验事实时，我们称这个研究纲领在不断进化；反之，当一个研究纲领不断陷于对既有事实的解释困境时，我们称之为退化的纲领。所以拉卡托斯认为证伪的层次应该放在研究纲领上，证伪一个纲领的标准是判断其是进化还是退化的。

综上所述，三个层次的贡献各有不同，并无大小之别。指导性战略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往往采用描述性的方式阐述其关心的核心问题和立场，并不特定地去建立与事实的直接联系。而个体理论是对特定事实的逻辑解释，有着非常清晰且可验证的构念定义和关系，并直接与特定的可观测的现实形成对应关系。理论研究纲领则是由若干具有共同“硬核”的个体理论组成，关注的重点并不在于理论与事实的关系，而在于这些个体理论之间的联系。

我们认为讨论中国管理研究的理论贡献应该放在理论研究纲领的层次上，原因有三。第一，理论研究纲领本质上是一个去情境化的一

系列理论的组合。中国情境可以是一个独特的社会实验场景，但在理论对话上，我们更关注中国情境对某个理论研究纲领的贡献，探讨硬核的解释范围，发现新的解释机制，使得某个理论研究纲领不断进化。第二，理论研究纲领所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我们不排除对中国管理实践的研究可以创造新的指导战略（orienting strategy）从而形成新的硬核，同时我们也鼓励探讨中国情境下的验证是否超出了现有理论的边界，从而在原理论基础上提出新的或修正既有的逻辑联系，从而丰富已有研究纲领的保护带。第三，在理论研究纲领层面讨论理论贡献，更能给我们未来的研究指明方向。研究纲领探讨的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联系，在此层面我们更能看清楚应该在哪些方面如何能够更好地产生理论贡献。我们在下文将在此层面重点讨论如何做出理论贡献。

#### 四、理论贡献的方向

要了解如何做出理论贡献，首先应该了解理论与理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从理论研究纲领层次上看，理论与理论之间有三种基本关系和两种特殊关系（Berger & Zelditch, 1993）。三种基本关系包括：详尽化关系（theory elaboration）、增值化关系（theory proliferation）以及竞争性关系（theory competition）。两种特殊关系包括理论变异（theory variation）和理论整合（theory integration）。这五种关系讨论的是若干个体理论之间抽象的逻辑联系，而不是逻辑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通过明确不同个体理论间的关系，可以指导研究者在什么方向上去发展相

应的个体理论。我们常说的“理论贡献”本质上是指新建立的个体理论比原理论在这些方向上形成了什么新的认识。因此这些关系不仅共同形成了一个研究纲领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也预示了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1) 理论的详尽化 (theory elaboration) 指新理论比原理论在适用范围、严谨性、精确性或者理论的实证完备性上又提出了更详尽的解释 (Wagner & Berger, 1985)。大多数研究的理论贡献都是在理论详尽化的关系上做出的，其中包括我们熟悉的增加新的中介机制 (变量)、增加新的调节变量等。新中介变量的增加细化了原有理论关于作用机制的解释，使原理论更严谨，实证上更完备；新调节变量的增加细化了原理论适用范围的理解，解释了在什么情况下原理论会表现得更显著或不显著。还有比如更进一步细化原理论中关键构念的不同维度以及其不同影响，也能使原理论在解释范围、严谨性和精确性上得到提升。所有这些努力都使原理论更详尽更完备，因此为整个理论研究纲领做出了新的贡献。比如池教授在文中提到的 Chi 和 Zhao (2014) 的研究就将过去知识基础观中的核心构念“企业能力”在局部能力 (component competence) 和建构能力 (architectural competence) 两个维度上进一步展开，分析跨国公司在向中国汽车制造业实体转让技术时，总体构划与工程设计 (Architectural Design Engineering, ADE) 技术和非 ADE 技术的本质差异，并结合内化理论分析了不同技术对内部化的需求差异。通过这种更严谨更精确的区分，使原有的知识基础观理论得到更详尽的讨论和理解。再比如 Poppo 等 (2016) 将过去笼统的

“信任” (trust) 进一步细化为算计型 (calculative trust) 和关系型 (relational trust)，在中国企业间的“关系”环境下利用 211 份问卷实证检验了两种不同的信任对供应商绩效的影响，发现虽然两种信任对供应商绩效都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客户方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越高，或供应方的市场不确定性越高，关系型信任而不是算计型信任对供应商绩效的影响越大；相反，当行为的不确定性越高，算计型信任而非关系型信任对供应商绩效的影响越强。研究不仅在核心构念“信任”的不同维度上展开了更详尽的描述，而且更进一步指出了适用的范围 (新调节变量)，从而使我们对传统的“信任”增加了新的认识。

(2) 理论的增殖化 (theory proliferation) 指将理论的应用领域从原有范围拓展到新领域，并用来解释理论原来不曾解释的现象 (Wagner & Berger, 1985)。这个现象可以是新现象，但更有可能是不曾被该理论解释过的已有现象。每个理论的产生都有与其对应的特定现象。“要理解组织的行为，就必须先理解该行为产生的情境” (Pfeffer & Salancik, 2003)，为了厘清理论的核心概念和逻辑，在理论发展的早期阶段，研究者往往聚焦于该现象范围不断细化理论的内涵。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开始不断尝试去解释更多的问题，应用范围也开始从原有现象拓展到不同领域的不同现象。比如资源依赖理论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RDT) 最开始最具代表性的应用领域是企业的并购现象 (merger and acquisition)，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如资源依赖、不确定性等都能在并购现象的情境中操作化，其核心逻辑也能在并购现象里得到

充分展示 (Hillman et al., 2009)。但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者开始将 RDT 逻辑不断增殖去解释其他现象或问题, 使 RDT 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比如 Xia 等 (2014) 运用 RDT 的逻辑去解释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现象。过去讨论 OFDI 大多数是从企业内部驱动因素的角度去研究, 而学者们在该研究中却引入了 RDT 逻辑, 从外部环境更进一步分析中国情境里国有产权对“相互依赖” (interdependence) 关系的影响, 从而验证了 RDT 理论逻辑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问题上的解释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比如 Zhou (2005) 将制度主义里的制度逻辑引入解释职业声望的等级制度中, 改变了过去只从权力和资源的角度解释职业声望的视角, 而拓展了制度逻辑的解释范围, 将以合法性和合适性为核心的社会认可逻辑拓展到了对职业声望等级的现象中。

(3) 理论的竞争性 (theory competition) 指两个理论拥有共同的待解释现象或问题, 但却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结构和理论预测。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个理论谁能解释得更多 (say more) 或者解释得更好 (fit better) (Wagner & Berger, 1985)。理论的竞争对理论研究纲领的发展至关重要, 它提供了不同理论之间的比较与选择。针对同一现象, 新理论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旧理论的概念、工具和逻辑, 有可能就此取代旧理论, 成为未来对该现象的主导性逻辑解释。正是由于这种竞争性往往涉及两个理论最根本的假设、概念和逻辑, 因此理论的竞争往往带来激烈的冲突。也由于旧理论为捍卫其地位而对自身理论结构不断修正, 理论的竞争并不会表现出一锤定音般的是非结论, 而会经历一个漫

长的过程。比如新制度理论中对于效率与合法性的争论。早期经济学的效率机制认为组织的趋同是技术效率导致的理性选择, 而新制度理论则认为这种趋同与效率无关, 而是来自合法性的压力。面对这一争论, 一系列文章在此方面做出了贡献。除了 DiMaggio 和 Powell (1983)、Meyer 和 Rowan (1977) 开创性的研究外, Tolbert 和 Zucker (1983) 对合法性机制进行了操作化测量、Haunschild 和 Miner (1997) 对模仿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等。上述这些经典研究都隐含着理论的竞争, 以效率视角为对比来阐述合法性视角的观点和证据。而对这一问题进行直接比较的研究则直接贡献到这一争论中, 比如 Kraatz 和 Zajac (1996) 直接对比了传统的效率视角和新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 从而揭示出新制度理论的潜在不足。

以上三种关系构成了理论与理论之间最基本的联系, 也决定了理论贡献最基本的方式。中国管理研究虽然变换了情境和可能的理论假定, 但在理论贡献上仍然应该围绕这三种关系展开。除了这三种关系外, 另外两种特殊关系: 理论变异 (theory variation) 和理论整合 (theory integration), 则经常与上述三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理论变异是对原理论在某些方面的修订以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境。比如知识基础观是对资源基础观的一种变异, 使其更符合对知识这种特殊资源的解释。而理论整合 (theory integration) 则是将不同的理论在同一个问题或待解释现象上进行整合, 从而弥补不同理论各自的缺陷。中国变化的市场和多样化的产权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实验场所, 当然也在上述这五个不同潜在路径上提供了大量的理论贡献机会。

应该说我们作为同时了解中国市场变迁以及其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有知晓西方管理理论发展脉络和逻辑的学者，应该在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对世界管理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

## 五、中国管理实践

中国现代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向西方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相对薄弱，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学习之路，学习苏联、西欧、日本、美国等先进的技术知识。尤其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要素日渐活跃，合资、并购和联盟等形式成为了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的重要途径。

技术可以分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谈及的技术引进，往往指设备和产品设计蓝图等硬技术的引进。除了硬技术的引进之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企业也引入了不少西方的软技术，即管理技术 (Gepper, 1996)，例如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目标管理、准时生产等。表 1 详细列举了制造业、零售业等中国的优秀企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管理学习历程。华为总裁任正非早在 1998 年就曾说过：华为最大的问题是管理落后，公司的当务之急是向国外优秀企业学习。谢伟 (2008) 认为，管理学习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发达国家的企业学习管理知识、规范、方法和程序等的过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和经营绩效 (Chen et al., 2016; Fu et al., 2012)。

表 1 中国企业引入西方企业的管理知识举例

企业名称	学习重点
上汽集团	通过向合资企业方学习，规范法人治理机构 (2000)；采购管理 (2000)；完善分配和激励机制 (2006)；推行精益管理 (2009)；价值链管理 (2009)；推进汽车金融在线服务 (2014)
苏宁	学习日本松下集团，推行股权激励机制 (2001)；学习 IBM 和 ICP 公司提升信息化管理能力 (2005)；与 IBM 合作开启“蓝深计划”，引入一体化管理 (2006)；学习三星、索尼推动供应链管理 (2007)；收购日本家电连锁公司 LAOX，引进日本先进商业设计理念 (2011)
华为	学习 Hay、CRG 的人力资源管理经验 (1997)；向普华永道、毕马威学习财务管理能力 (1998)；学习 IBM 集成产品开发管理能力 (1999)；学习 IBM 集成供应链管理 (2000)；学习 Mercer 的决策机制 (2004)；学习 Accenture 客户管理 (2007)；学习奥美、Morton、BBH 的品牌管理能力 (2011)
海尔	向通用电气学习多元化战略和质量管理体系 (1992)
联想	向三星学习研发战略 (2012)；向戴尔学习直销模式 (2005)
TCL	向 IBM 学习切割非核心业务，向服务业转型 (2004)；向诺基亚学习企业变革的实践 (1998)；向三星学习研发战略 (2003)

资料来源：笔者基于张娜娜等 (2019) 的研究以及网络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技术学习和管理学习使中国企业在实践中逐渐习得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结合本土消费市场的特征，在学习中又加以改进和创新，形成了中国企业成长中独具特色的模仿创新之路 (傅家骥, 1998)。因此，从中国现代企业成长的实践来看，与西方企业的管理实践

是不可割裂的，正如池老师在其文章中所说，“中国现代企业的发展与成长，和中国经济在改革开始后高速发展一样，同引进外国经济和管理理论与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管理理论源于实践，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实践中管理学习的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管理理论研究不能脱离西方的管理理论，两者的实践基础是紧密相连的。

接受编辑：Haiyang Li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26日

接受日期：2019年10月27日

作者简介：

杨冶（E-mail: zhiyang@hust.edu.cn），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战略管理、创新管理和组织理论。发表文章见于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 *China Economic Review*, 《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等刊物。

王砚羽（E-mail: wangyy.12@sem.tsinghua.edu.cn），现任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战略管理和组织理论。文章发表于 *R&D Management*,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和《管理世界》等刊物。

夏军（E-mail: jun.xia@utdallas.edu），现任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管理学院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组织理论（资源依

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和战略（兼并，合资、海外投资、创新和国有企业转型）。发表文章见于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和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等刊物。

### 参考文献

[1] 蔡玉麟：《也谈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和管理理论创新——向张静、罗文豪、宋继文、黄丹英请教》，《管理学报》，2016年第8期。

[2] 傅家骥：《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 韩巍、赵向阳：《“非科学性”让管理研究变得更好：“蔡玉麟质疑”继续中》，《管理学报》，2017年第2期。

[4] 刘晓力：《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社会心理科学》，2003年第1期。

[5] 潘越、宁博、纪翔阁、戴亦一：《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经济研究》，2019年第7期。

[6] 谢伟：《管理学习的定义、特点及影响因素》，《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10期。

[7] 张娜娜、谢伟、臧树伟：《管理学习的过程及来源：上汽集团的案例研究》，《科研管理》，2019年第4期。

[8] 张娜娜、谢伟、格佛海：《管理学习的过程模型：基于苏宁的案例研究》，《科学学研究》，2019年第2期。

[9] Bai, C. E., Lu, J., & Tao, Z. 2006. The multi task theory of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6: 353-357.

[10] Berger, J., & Zelditch, M. 1993.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grams: Studies in the Growth of The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Bettis, R. A., Ethiraj, S., Gambardella, A.,

Helfat, C., & Mitchell, W. 2016. Creating repeatable cumulative knowledge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A call for abroad and deep conversation among authors, referees, and editor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257-261.

[12] Chen, P. L., Tan, D., & Jean, R. J. B. 2016. Foreign knowledge acquisition through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and recruitment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growth of emerging market firm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 221-232.

[13] Chi, T., & Zhao, Z. J. 2014. Equity structure of MNE affiliates and scope of their activities: Distinguishing the incentive and control effects of ownership.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4: 257-279.

[14] Colquitt, J. A., & Zapata - Phelan, C. P. 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 1281-1303.

[15] Corley, K. G., & Gioia, D. A. 2011.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12-32.

[16] Cornelissen, J., & Durand, R. 2012. More than just novelty: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causal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7: 152-154.

[17]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147-160.

[18] Eisenhardt, K. M. 1989. Agency theory: An assessment and re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57-74.

[19] Farh, J. - L., & Cheng, B. - S. 2000. *A Cultural Analysis of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J. T. Li, A. S. Tsui and E. Weldon (Ed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  
— 26 —

text. London: Aacmillan.

[20] Fu, X., Helmers, C., & Zhang, J. 2012. The two faces of foreign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FDI and productive efficiency in the UK retail sect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1: 71-88.

[21] Gepper, M. 1996. Paths of managerial learning in the East German context. *Organization Studies*, 17: 249-268.

[22] Haunschild, P. R., & Miner, A. S. 1997. Mod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imitation: The effects of outcome salience and uncertain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2: 472-500.

[23] Hillman, A. J., Withers, M. C., & Collins, B. J. 2009.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A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35: 1404-1427.

[24] Jensen, M. C., & Meckling, W. H. 1976.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305-360.

[25] Kepes, S., Bennett, A. A., & McDaniel, M. A. 2014. Evidence-based management and the trustworthiness of our cumulative scientific knowledg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13: 446-466.

[26] Kraatz, M. S., & Zajac, E. J. 1996. Exploring the limit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illegitimate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 812-836.

[27] Kuhn, T. S. 1974.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 In F. Suppe (Ed.),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8] Lakatos, I. 1976.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Harding S. G. (Eds.), *Can Theories be Refuted?* (pp. 205-259). Springer, Dordrecht.

[29] Li, D. D. 1996. A theory of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case of the Chinese non-

state sector.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19.

[30] Lippmann, S., & Aldrich, H. E. 2016. A rolling stone gathers momentum: Generational units, collective memory, and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1: 658-675.

[31] Marquis, C., & Tilcsik, A. 2013. Imprinting toward a multilevel theory.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7: 195-245.

[32]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340-363.

[33] Pellegrini, E. K., & Scandura, T. A. 2008.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 566-593.

[34] Peng, M. W., & Luo, Y. 2000.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3: 486-501.

[35] Pfeffer, J., & Salancik, G. R. 2003.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36] Poppo, L., Zhou, K. Z., & Li, J. J. 2016. When can you trust "trust"? Calculative trust, relational trust, and supplier perform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7: 724-741.

[37] Ross, S. A. 1973.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134-139.

[38] Shapira, Z. 2011. "I've got a theory paper—Do you?":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Organization Science*, 22: 1312-1321.

[39] Shepherd, D. A., & Sutcliffe, K. M. 2011. Inductive top-down theorizing: A source of new theories of or-

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361-380.

[40] Smith, K. G., & Hitt, M. A. 2005. *Great Minds in Management: The Process of Theory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n Demand.

[41] Suddaby, R., Hardy, C., & Huy, Q. N. 2011.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topic forum: Where are the new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 236-246.

[42] Sutton, R. I., & Staw, B. M. 1995. What theory is no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371-384.

[43] Thornton, P. H., & Ocasio, W. 2008.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Sage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alism*, 840: 99-128.

[44] Tolbert, P., & Zucker, L. 1983.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change in the formal structure of organizations: The diffusion of civil service reform, 1880-1935.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8: 22-39.

[45] Wagner, D. G., & Berger, J. 1985. Do sociological theories grow?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697-728.

[46] Wang, D. Q., Du, F., & Marquis, C. 2019. Defending Mao's dream: How politicians' ideological imprinting affects firms' political appointment in China.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2: 1111-1136.

[47] Whetten, D. A. 1989.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490-495.

[48] Williamson, O.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49] Xia, J., Ma, X., Lu, J. W., & Yiu, D. W. 2014.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emerging market firms: A resource dependence logic.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5: 1343-1363.

[50] Xia, J., Tan, J., & Tan, D. 2008. Mimetic

entry and bandwagon effect: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equity joint venture in Chin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9: 195-217.

[51] Xiao, Z., & Tsui, A. S. 2007. When brokers may not work: The cultural contingency of social capital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2: 1-31.

[52] Zhou, X. 2005.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ranking: Reconceptualization and reanalys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90-140.